

影片《啼笑姻缘》

诉讼案始末（上）

这场由《啼笑姻缘》版权纠纷而引发的诉讼官司，被称为《啼笑姻缘》双胞胎案（张恨水小说原名《啼笑姻缘》，拍摄影片时改名《啼笑姻缘》）。这是中国电影史上100年来的第一桩电影官司。它由不意“撞车”而偶然突发，个中情节曲折离奇、此起彼伏、亦是亦非、变幻莫测并旷日持久，结果竟由几个流氓大亨出面了断。在此案中，旧社会的黑暗、旧官场的昏聩，以及出场人物的千姿百态，无不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第一个吃螃蟹的人

凡是喜欢欣赏京戏的观众，大概都知道清末民初的京剧名角、须生泰斗、“谭派”创始人谭鑫培。但是，他是中国第一部自己摄制的影片的主演者，这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了。所以有人说：中国电影明星的“祖师爷”是谭鑫培。

那是1905年的事情。当时，外国影片源源不断输入中国放映，受到观众的欢迎，一些外国影片商也因此大发其财。眼看这种情况，一些接受西方文明洗礼的我国知识分子，产生了拍摄中国电影的愿望。而最早有此设想并付之实践的，是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（今南新华街小学原址）的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。

任景丰是沈阳人，青年时代留学日本，学习过照相技术，回国后在北京开设丰泰照相馆，是当时绝无仅有的一家；生意兴隆，规模也随之日益扩大，后来就在前门外大栅栏开设了大观楼影戏院。

这个在清末被视为“新派”人物的任景丰，有感于当时在中国放映的都是外国影片，又都由外国人经营，而且片源缺乏，放来放去就这么几部片子，就产生了拍摄中国影片的念头。他从德国商人那里购得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

机一架及胶卷14卷，就这样尝试着一个前景广阔的辉煌事业——拍摄国产影片。

这位国产电影的拓荒者摄制的第一部影片，就是由谭鑫培主演的京剧《定军山》中《请缨》、《舞刀》、《交锋》等场面，谭扮演黄忠。那时既没有剧本，也不懂得利用灯光照明等技术，摄影师是丰泰照相馆的技师刘仲伦，是利用日光在露天广场摄制的。片长两本，大约可以放映20分钟。

1913年，郑正秋为亚细亚影戏公司编写了《难夫难妻》（又名《洞房花烛》）电影剧本后，又和张石川联合导演了这部电影。影片中的演员由一班文明戏演员担任，女主角由男性扮演。

影片《难夫难妻》的故事是郑正秋以家乡潮州的旧式婚姻为题材搬上银幕。故事从媒人的撮合写起，经过种种繁文缛节，直到把两个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进洞房为止。片长四本，当时在上海圆明园路一块空地上，圈上一圈竹篱笆，利用日光拍摄的，这就是我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故事短片。该片于当年9月底，在上海原来演出文明戏的新新舞台首次放映。

任景丰、郑正秋、张石川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是中国电影事业的拓荒者。作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的导演郑正秋

和张石川,《难夫难妻》虽然拍出来了,但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干的这项工作就是“导演”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,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中国新兴工商业的受挫,使得当时一部分工商业主,在他们的资本寻求新的出路时,其中一些有志于中国电影事业的人士独具慧眼,看中了中国方兴未艾、前景无限广阔的电影市场。

于是,短短几年时间,大大小小的电影制片公司,如雨后春笋,遍地开花。由于电影制作是一门新兴事业。同时又有丰厚的利润,在这些投资者中,就不免鱼龙混杂,泥沙俱下。其中当然也有献身中国电影事业的第一代创业者,但也混进了买办、流氓、投机家和小商人。

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国际、国内形势的煎熬之后,中国电影萌芽期结束了,大规模制作影片和建立更多影片公司的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。中国电影也开始了从无声片到有声片、黑白片到有色片(非彩色片)的过渡。

向张恨水购得 《啼笑因缘》版权

就在这时候,中国影坛爆发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诉讼官司。诉讼的一方是影片《难夫难妻》的导演张石川,另一方是顾无为。那时候,张石川是明星影片公司的老板,顾无为是大中国影片公司的老板。

明星影片公司和顾无为之间的这场官司,从1931年10月,一直打到第二年的9月,前前后后、反反复复持续了一年。官司是因小说《啼笑因缘》的版权引发的。

《啼笑因缘》是鸳鸯蝴蝶派著名作家张恨水,应同是鸳鸯蝴蝶派的中坚严独鹤之约,于1929年开始创作的长篇言情小说。

张恨水用了半年时间,就完成了这部长篇力作。并于1930年3月17日开始,在由严独鹤主编的上海《新闻报》副刊《快活林》上连载,至同年11月30日载完。

作品以上世纪20年代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,描写了说书艺人沈凤喜和杭州书生樊家树的爱情悲剧故事。

富家子弟樊家树来到北京,在逛天桥时,与武艺超群的关寿峰结为知己,并与其女秀姑相识。后来寿峰染病,家树尽力相助,并常去探望,秀姑开始暗暗爱恋家树。

一天,家树信步来到先农坛,遇见唱大鼓的少女沈凤喜,沈虽十分寒素,却有清眉之态。一曲终止,家树慷慨解囊施舍。还为沈家租赁新宅,让她脱离卖艺生涯而入学读书。

一天,经表兄嫂介绍,家树又认识了社交界的明星何丽娜小姐。小姐之父是财政总长。何小姐对家树颇为亲热,心向往之。

于是,三个女性形成了以樊家树为主轴的多角恋爱关系。但何丽娜的风流和关秀姑的勇义,都没有打动家树的心,他一意倾心于凤喜,姑娘遂与家树定情盟誓,愿终身相许。

由于凤喜和何丽娜相貌酷似。一次,家树的表兄嫂在家树那里看见凤喜的照片,误认为是何丽娜的照片,并以为家树瞒着表兄嫂而私下和何小姐相爱,便执意想要成全他俩的好事。

正当家树和凤喜的爱情达到难舍难分之际,家树因母亲病重而离京南归。这期间,军阀刘德柱依仗权势,设下圈套,将凤喜占为己有。

樊母病愈,家树回京,凤喜已身陷魔窟,家树闻之,心如刀割。在秀姑帮助下,家树和凤喜在先农坛会面。后被刘德柱得知,在刘的百般摧残下,凤喜精神失常,住进了精神病院。

凤喜住进精神病院后,刘德柱见秀姑美貌,要她做接替人。秀姑怒火中烧,却假意应允,将他骗至西山旅行结婚,于洞房花烛之夜,将其杀死。家树得知消息,为避免牵连,就避到天津叔父家。

何丽娜也随后到了天津,交给家树他叔父写给她父亲的一封信。原来表兄把他俩的事告诉了双方家长。家树叔父是何总长的下级,很快就同意这门亲事。家树感到事情来得突然,没有答应,丽娜伤心至极,留下字条,回到北京。家树在天津逗留一段日子后也返回北京。

数天后,家树应关氏父女之邀来到西山,在一座华丽的

▲ 任景丰



▲ 张石川

别墅里遇见了何丽娜。原来关氏父女见凤喜医治无效，今生和家树难圆百年好梦，且知家树与丽娜事情，乃设计让家树与隐居在西山的丽娜见面。秀姑留下一张半身照片，和父亲一起告辞。丽娜把家树请到客厅，两人默视无语，家树冰冷的心，开始融化。

樊、何订婚，并同赴德国留学。关氏父女赴东北参加一

支义勇军。此



▲ 谭鑫培主演的《定军山》

时正值抗日军兴，樊、何提前回国，参加抗战。家树和凤喜再度相

会，凤喜病人膏肓，经不起刺激，几天后便溘然长逝。关氏父女也在一次与敌人战斗中，为国捐躯。

清明时节，樊、何来到郊野，为凤喜、为关氏父女默默祭奠致哀……

《啼笑因缘》问世后，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。张石川看到《啼笑因缘》受到小市民的广泛欢迎，就向张恨水购得小说版权，计划拍摄电影。不料，一场电影官司，因此而引发。

官司发生前的形形色色

张石川，原名张伟通，字蚀川，浙江宁波人。16岁丧父，随舅父经润三到上海闯码头，时为1905年前后。

经润三当时给在上海经营房地产生意的美国人当买办，担任华洋公司的总经理。他把外甥张石川引进“华洋”，当

了一名文秘类小职员。但张石川一心要向上爬，将来也想和舅父一样当大买办。因此，白天上班，晚上读英文夜校。一两年后他就能讲一口洋泾浜英语，能直接和美国人对话了。

1913年，美国商人依什儿和萨弗，看到在中国拍电影有利可图，就办起了一个亚细亚影戏公司。他们找到了会讲英语的张石川，让他当顾问。这年张石川才21岁，虽然连电影还未看过几部，但却主持起“亚细亚”拍电影的事务来。

▲ 文明茶园位于北京西单商场内，是早期北京电影放映场所

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外国胶片断档，亚细亚影戏公司也就关门了。

电影拍不成，张石川去替另一位舅父、经润三的弟弟经营三掌管文明戏班民鸣新剧社。和哥哥经润三比起来，经营三的名气当然要小一些，但仍是上海一位有头面的商人，实力雄厚。

就在民鸣新剧社，张石川和后来爆发的这场电影官司的对手顾无为开始相识、共事。顾无为是我国文明戏时代的著名人物，在辛亥革命的时候，文明戏是爱国志士的宣传工具，曾经起过进步作用。

不久，经润三筹办新世界游乐场，张石川又给经润三去跑腿。1915年，“新世界”在南京西路西藏路口开幕，百戏杂陈，生意兴隆。

几年后，经润三去世，他的妻子汪国贞接手经营。当初经润三创办“新世界”时，是和黄楚九合伙的。经润三一死，汪国贞和黄楚九争权夺利，闹翻了。黄楚九另起炉灶，办起了大世界游乐场。汪国贞就派外甥张石川当经理，要他想办法对付黄楚九。

张石川苦思冥想，建议舅母汪国贞扩大业务，压倒对

方。汪国贞听信外甥的建议，把“新世界”对面一块空地买了下来，又办起了“新新世界”，新添了戏曲杂耍、溜冰场、弹子房……等游乐项目。

在上海滩已稍有名气的黄楚九岂肯败在张石川、汪国贞门下，早在“新新世界”开张营业之前，他已领先一步，在“大世界”增添了不少游乐项目和设施，还别出心裁，聘请沪上名妓轮流登台搞“群芳会唱”以招徕游客，传为一时之盛。张石川不甘示弱，也在妓女头上动脑筋、玩花样，搞了一个开“花会”的玩意，选举上海名妓作为“花国总统”，



张恨水

用以抵制黄楚九的挑战。原来汪国贞是想新建“新新世界”来压倒对方，如今却变主动为被动，处于应战地位了。

为变被动为主动，张石川又想起一个新招，因为“新世界”和“新新世界”之间隔着一条马路，他想架起一座空中天桥，把两处连接起来，用一张票可玩两处游艺场的办法来吸引顾客。因为此举牵涉市容市貌等原因，工部局不准。张石川不死心，就从天上想到地下，决心开一条地道，实现自己的幻想。

然而，不幸的是地不作美。地道开好后，不断冒水，游客们拥来挤去，常常弄脏鞋袜衣裤。游客高兴而来，扫兴而归，光顾者日渐稀少。两厢斗法，汪国贞败下阵来，只好把两处游艺场先后盘出。

1920年，张石川得到上海大皮货商、买办资本家何泳昌的赏识，“新世界”垮台后，恰巧有家瑞慎洋行穿引，想聘何泳昌去当经理。何借故不就，力荐张石川，就这样，张石川轻而易举地做了瑞慎洋行的买办。

差不多与此同时，上海开设交易所之风日盛，张石川很想碰碰运气，就拿着何泳昌送给他的2000元，约了几个朋友在贵州路办起了“大同交易所”，准备做股票生意。

有一说是张石川这次投机失败后，以亏蚀剩余资本为基础，与人合作发起组织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。但也有一说是，在筹办交易所，等候当局发给执照时张又改了主意，想再办影片公司，于是再度和郑正秋合作，又约上周剑云、郑鹧鸪，后来又加上任矜苹，五人一共凑了万把块钱，对外号称5万资本，这家后来被称为中国资格最老的电影公司就这样草草诞生了。那是1922年3月的事情。

《啼笑姻缘》剧照

1923年，张石川和何泳昌女儿何秀君结婚，张有了可靠的后台老板。何曾对张石川说：

“放心去闯，用钱就到我家去取！”

1920年代后期，“明星”逐渐正规化，几位老板也正式分了工。张石川担任总经理，兼作导演，负责拍片事宜；郑正秋担任协理，负责编剧、兼作导演；周剑云当经理，总管对外交际，签订合同等等。这期间，郑鹧鸪于1925年病逝，任矜苹于1926年离去，剩下郑、张、周三位老板，继续合作，直到1935年郑正秋病故。

几年工夫，“明星”从无到有，从制片到发行，都有长足的发展。但是，由于投机性大，更因同行倾轧，在前进的道路上，矛盾重重。

那时候拍电影是很有油水可捞的生意。一部影片拍成，全部开支4000银元就够了，洗印一个拷贝只需银洋300元。从当时2个银元折合1元美金计算，大约2000多美元，即可拍好一部无声影片。上映后可收入10000多元，可赚一倍以上的钱，旧社会叫“对半生意”，是赚头最好的生意了。因此，各家公司只要预算决算没有抵触，就可坐收厚利。这种发财生意，引人眼红，电影公司老板见有这等好处，哪个不拼死拼活，一窝蜂趋之若鹜，投机拍片。

所以，在1930年代中后期，上海电影业就在这种高利润的刺激下，畸形地发展起来。大大小小的电影公司多如牛毛。大家见钱眼开，竞争非常厉害。特别是一些招摇撞骗的“皮包公司”，以极少的资本，简陋的设备，偷工减料、粗制滥造地拍片。因为当时拍片成本不高，放映市场广阔。只要影片拍得还有“噱头”，就不愁卖不出去。

这些公司没有固定演员，只要能雇到几个男女演员，到旅馆里去开个房间，化好妆，既不要布景，也不要租家具，旅馆房间现有的陈设就是小姐的香闺，利用日光拍片，一拍

几千尺，所费不过几天房租费。拍外景更加方便，选个风景区，拉上亲戚朋友当临时演员。然后叫男女主角溪边花下，情意绵绵地表演一番。至于演员的待遇都很低，女主角日酬银洋4元至7元，其他演员酬劳就更少了。当时还出现不少所谓“一片”公司，也就是东拉西扯拍一部片子，捞点油水的投机商的勾当。

为了赶时间，剧本来不及写，编导就只在本子上记几句话或画些符号，然后一声令下，就召集演员到摄影场去拍片了。好在当时都是无声片，演员只要掌握角色不离谱，表演能对路就可以了。嘴里说什么都没关系，反正最后由片子上的字幕来说明剧情。

这些以投机牟利为目的的影片商，他们出产的低劣影片，对电影市场的冲击极大，不出十天半月一部电影就问世了，这对一些比较正派的电影公司来说十分不利，规规矩矩拍片成本高，周期长，根本无法和他们竞争。

明星影片公司各创办人之间，对制作电影有两种看法，张石川是站在纯商业观点上的，认为拍片就是做生意，只求赚钱。郑正秋认为赚钱之外，还要把电影当作“改良社会”的工具。所以他主张拍“长片正剧”进行社会教育。而张石川的主张是：“处处唯兴趣为尚，以冀博人一笑，尚无主义之云。”两人的意见是相左的。当时另一位老板任矜莘是赞同郑正秋的主张的。但公司制片计划的决策人是张石川，因此明星公司的拍片方针基本上遵照张石川的意图行事。

不过，张石川又和一些招摇撞骗的投机商有所区别。明星影片公司毕竟是数一数二的大企业，他还必须维护公司的形象和信誉。为了压倒众人，处处要端架子、讲排场，拍片也比较认真。

同时，张石川到底还可以算是一个企业家，出身书香世家，他懂得商业信誉对公司的重要性，更知道大明星、红编导是公司的命根子。所以在制片上，他反对粗制滥造，对演员、编导要信任尊重，照应好。胡蝶红起来之后，“明星”给她的报酬是月薪2000元银洋，实支1000元，另1000元算公

司欠她的。1000元银洋在当时是一个可观的数字，因为那时大米才卖10元左右一石（旧时一石大米156斤）。另外，公司还供给她一部汽车长期自用。

不要以为《红楼梦》的贾府中总是灯红酒绿，大观园中只有儿女情长。在那白花花的银子进进出出的背后，贾府的主子也曾有过多少甜酸苦辣，这就叫“大有大的难处”。明星影片公司的情况也是一样。当他们的规模越搞越大时，片子虽然能够卖钱，可是开销也流水一样淌出去。公司依然经常闹饥荒。张石川的夫人何秀君说的一番话，道出了明星影片公司当年的处境：

● 亚细亚公司同人合影

“身为老板娘，我也真没少跟着他们伤脑筋。公司大了，动辄上万的出入开支。太大的数目我也管不了，但日常小小用项，一时周转不灵，少不得由我拿些衣物抵挡一阵。”她还说：

“那几年，我的私房首饰、皮货细软不知进进出出当铺多少回。我有一个姨母就专为替我当东西而来我家的。”

“明星”在竞争中发展，上海的电影公司也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。大家都要招兵买马，竞争十分激烈。

明星影片公司当时已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公司，它拥有郑正秋、包天笑、洪深、田汉、程小青等一流的编剧；拥有张石川、卜万苍、程步高、蔡楚生等一流的大导演和胡蝶、

阮玲玉、杨耐梅、宣景琳、夏佩珍、肖英、龚稼农、丁子明、高占非、高倩萍等一大批男女明星，阵容坚强，实力雄厚。他们千方百计要战胜对手，把他们打垮。最后决定采取两种办法：

◎《歌女红牡丹》剧照

一是由公司老板之一的周剑云写文章，在报刊上大声疾呼，反对粗制滥造，争取社会舆论和观众的同情和支持。二是大家动脑筋，齐心协力拍出好影片来。

张石川在商业竞争中，向来精明过人，正当大小公司还在乱哄哄地夜以继日赶拍乌七八糟的无聊影片时，张石川早已把目光瞄准了平江不肖生（向恺然）所著的小说《江湖奇侠传》。凭多年拍摄电影的经验，他敏锐地意识到，如将《江湖奇侠传》改编成电影肯定卖座。于是立即动手改编。拍成电影后，取名《火烧红莲寺》。

据说，该剧编剧是郑正秋。导演张石川拍第1集时，是依照剧本拍的。但拍到第2集时，就把剧本抛在一边，完全凭自己的感觉与当时脑子里冒出来的情节拍下去了。只在每集结尾时卖个关子，不让红莲寺里的和尚被斩尽杀绝，故意放走一个大和尚做伏笔，视生意情况再作定论，如好的话就以伏线作引子，继续随心所欲地编拍下去。拍到哪里算哪里，开了头还不知怎样收尾。就这样从1928年拍到1929年。

影片于1928年5月正式公映。不料此片一出，远近轰动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。

谁能想到，红莲寺的这把火，竟烧出无数刀光剑影，敲开了武侠神怪影片的大门。自那时起，武侠神怪影片大受小市民的欢迎和南洋片商的青睐。一些小公司的老板们眼看拍摄这类影片油水足，也来个急转弯，纷纷去拍武侠神怪片。于是，武侠神怪片替代了前一时期曾风靡一时的古装民间故

事片而大大地流行起来。

武侠神怪影片的大门一开，几十家大小制片公司一哄而上，像中了邪着了魔似的竞拍“火烧”片。什么《火烧青龙寺》、《火烧白雀寺》、《火烧百花台》、《火烧白莲庵》、《火烧剑峰寨》、《火烧韩家庄》、《火烧九龙山》、《火烧七星楼》、《火烧灵隐寺》等等……一时间，刀枪剑戟、腾云驾雾、烧烧杀杀，直到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，才纷纷收场。

“火烧”片烧红了上海滩，但一阵狂热过后，明星公司的老板们的注意力，又被另一桩新兴的生意经所吸引，这就是有声电影。

原来，美国有声电影当时垄断了整个中国市场，票价很贵，最高每张卖到银元1元6角。在这种高利润的刺激下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：如果继续拍无声片，将会有被淘汰的危险，拍摄腊盘有声片也只是权宜之计，可是改拍有声影片，问题又真不简单。一是过去拍摄无声片的设备，要彻底改造，要添置录音设备系列，洗印、拍摄等技术都要更新；二是中国的无声电影院，一时不能装上有声设备；三是从无声片向有声片过渡，需要一大笔资金投入。凡此种种，一时困扰着中国的电影制片商们。

我国开始拍摄有声影片是在1931年，拍的是《雨过天青》和《歌场春色》，但都是在国外人的技术支援下摄制完成的。严格来讲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产有声片。

在有声电影摄制器械未进口之前，真正由我国自己摄制的是腊盘配音有声片，即“明星”公司的《歌女红牡丹》和友联公司的《虞美人》。虽从艺术和技术上看，都很幼稚和不成熟，但就当时初创条件下，“明星”和规模较小的友联公司，能有勇气进行这种大胆的尝试，并得到初步成功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。但这两部影片与“真正的有声片”之间尚有相当差距。

明星公司是一个大公司，当时已奋起直追，正尝试拍摄腊盘配音有声片。为了更适应时代和市场的潜在需要，在拍摄无声片还是拍摄真正国产有声片的问题上，已别无选择。因此，明星公司决定筹集巨资，派出洪深赴美采购制作有声电影的器材和设备，同时聘请美国技术专家来华指导。“明星”派出洪深赴美采购有声电影器材的同时，又筹集巨资全力以赴投入《啼笑姻缘》的拍摄。不料在上海、南京相继发生了侵权事件。

硝烟顿起

1931年10月，中国影坛首场官司终于发生了。

《啼笑姻缘》小说版权官司，又被称作《啼笑姻缘》双胞胎案。

根据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有关规定,一部小说要改编成电影剧本,搬上银幕,电影公司除了必须购得小说版权之外,还需呈请国民党内政部发给摄制电影许可证。

明星影片公司向张恨水购得《啼笑因缘》小说版权,全力以赴投入拍摄。他们满心想通过它在经济上打“翻身仗”,于是就拼命扩大影响,渲染自己的实力,在报上登出大幅广告:“声明权益所有,不准他人侵权”的通告。

考虑到张恨水的长篇言情小说《啼笑因缘》放映后一定“抢手”,为防别人来“掠夺成果”,明星公司就下了大决心,坚定地向张恨水购得小说版权,同时又迫不及待地又是声明,又是通告。

“明星”的忧虑,不幸被言中,几乎与此同时,“撞车事件”还是发生了。

首先被明星公司发现的,是上海北四川路上的广东大舞台正在演出京剧《啼笑姻缘》。明星公司马上由公司聘请的常年法律顾问顾肯夫、凤昔醉出面,找到剧团负责人刘筱衡、蓉丽娟,提出严重警告,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演出。

京剧《啼笑姻缘》是一出大戏,他们从改编到演出,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。旧社会的艺人,求生不易,马上就要他们停演,艺人的生活就会受到威胁。剧团方面只得请出大流氓顾竹轩出面调解,公司方面才同意改名为《戚笑姻缘》,并作短期演出后即收场了事。

无独有偶,大中国影片公司的老板顾无为一方面在日本悄悄拍摄有声影片《雨过天青》,企图在影坛上一鸣惊人,一方面又在南京经营大世界游乐场,正巧顾也看中了张恨水的这部小说,改编成舞台剧后,在那里上演,无意中与“明星”撞了车。

明星公司得到信息后,更增强了“自卫”的勇气,但由于郑正秋、张石川等几位老板和顾无为都是演文明戏时结识的老朋友,比较熟,又都知道顾无为不是等闲之辈,必须认真对待,所以紧急开会研究对策。

在研究如何对待顾无为时,郑正秋提出了“以和为贵”的主张。

但是公司另外两位老板张石川、周剑云则仗着自己是大公司,且又已购得小说版权,认为成竹在胸。特别是对《啼笑姻缘》寄予的厚望,所以都不赞成以和为贵息事宁人的主张,坚决表示不能等闲视之,要告顾无为侵权。

经过讨论决定,由周剑云代表公司出面,去法院交涉。

顾无为在南京万万没有想到南京法院会给他送来一纸传票。面对“明星”周剑云的控告,顾无为大吃一惊,再想想自己虽然出于无意撞了车,但客观上已构成侵权事实,于是也只能想办法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,通过关系向明星公司老

板进行疏通,以求私了。

然而对明星公司来说,也是骑虎难下,因为他们为此曾不惜一掷千金。1931年夏,为筹拍《啼笑姻缘》等有声片,明星影片公司派洪深赴

● 杜美路上的明星影片有限公司

美国采购有声电影器材,两部叫作“四通通”的录音机,就花去1万1千美金,一部有色摄影机花了1万多美金。同时还用高薪聘回三个美国技师:制片人茄逊、摄影师斯密司和助理摄影师威廉生。

这次洪深赴美购有声电影机器,花掉近3万美金,三个美国技师来上海后,每人周薪约200美金,还要提供高档食宿,大有不堪负担之苦。因此,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正在筹备拍摄的《啼笑姻缘》上。

虽然这时的明星公司已山穷水尽,但他们还是东拼西凑,投入大量资金。为了一鸣惊人,他们还把张恨水从北平请来上海,每月发给工资数百元,特约他和严独鹤作为影片《啼笑姻缘》的编剧,张石川也参与了共同创作并执导。

为了把《啼笑姻缘》拍好,“明星”的全部演员倾巢出动,主要演员有胡蝶、夏佩珍、郑小秋、肖英、王献斋、严月嫔、龚稼农等。摄影是董克毅、王士珍和美国技师威廉生。还派出一个摄影组到北平拍摄外景。

以上种种,说明“明星”为筹拍有声片投下了血本。因此,也抱有极大的期望值。他们怎能容忍顾无为如此乱来呢?且不说顾的《雨过天青》,已比“明星”早走了一步,惹得“明星”好不恼火,而今又打“野炮”,这不经意的“撞车”,可给“明星”治顾无为逮住了一个机会。(下期续完)

档案春秋